新民晚报
社区版
家庭周刊
2026年11月25日~12月1日
本期 8 版
第 F-947 期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-0062　总第 9650 期　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·上海新民社区传媒有限公司出版

串联九十载历史记忆，『红星』的故事从未中断

斯诺主题展亮相上海，近200件展品讲述中国情缘
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也是美国记者、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作者埃德加·斯诺初次访问陕北90周年。

11月9日，“红星·漫记·长征路——埃德加·斯诺与中国”主题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（上海市革命历史博物馆）（下称“上历博”）揭幕。这场由十余家收藏单位联合打造的展览，经过策展团队历时一年多筹备，与民间力量共同参与，汇集近200件珍贵展品，循着斯诺的人生轨迹铺展叙事，完整还原了他与中国跨越40余年的深厚情缘。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◆记者　曹儒屹



■“红星·漫记·长征路——埃德加·斯诺与中国”主题展



■周煜在介绍策展故事

斯诺中国之行从上海开启

走进东楼一楼临展厅，循着展墙的叙事脉络缓步前行，仿佛跟着斯诺重走了一遍他的中国之路。

1928年，22岁的美国青年斯诺揣着冒险梦来到上海，原本只打算停留六周，却一脚踏进了改变他一生的洪流。展厅里复原的沙利文咖啡馆一角，复刻了90多年前的模样：木质吧台、复古吊灯，老照片里的青年男女谈笑风生。正是在这里，斯诺结识了宋庆龄，也遇见了后来的伴侣海伦·福斯特；也是在这里，他对中国的认知从模糊的东方想象，慢慢落到了具体的人与事上。一·二八事变的炮火打破了咖啡馆的闲适，斯诺与海伦亲临淞沪战场，把中国军民的抵抗消息连夜发往海外，1933年出版的《远东前线》，第一次让西方读者看到了日军侵略的真实面目。

展柜里有一枚印着“施乐”二字的名片，这是斯诺给自己取的中文名。1933年他拜访鲁迅，鲁迅在日记里记下“晚晤施乐君”。斯诺后来总说：“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。”

正是在上海的经历，让斯诺生出了亲自去陕北看看的念头。1936年，他特意向宋庆龄提出访问苏区的请求，一位化名“王牧师”的上海青浦人接下了护送的任务。“王牧师”真名董健吾，公开身份是圣彼得堂的牧师，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员。

展柜里一块刻有题字的鱼骨化石，是这段秘密往事的珍贵信物：这是董健吾完成护送任务、从陕北返回上海后，特意送给宋庆龄的纪念品。另一旁展柜里摊开的《逸经》杂志上，署名“幽谷”的《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》赫然在目，这是国民党统治区首次在公开刊物标题中直接使用“红军”称谓，出版时间比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还要早。


■斯诺夫人海伦在中国写作时用的打字机（右）与王福时用过的打印机（左）

1936年6—10月，斯诺冲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根据地，成为第一位深入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。4个月的时间里，他记下16本密密麻麻的笔记，拍下24只胶卷的照片，从苏区的邮政局、公共读报墙到红军剧社的演出，把红色根据地的日常鲜活地定格下来。

在展厅中央，两台并排摆放的老式打字机总能让观众不自觉地停下脚步：一台“ROYAL”牌打字机是海伦在延安写作时的随身之物，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从西安远道而来；另一台外壳磨得发旧的打字机，属于进步青年王福时。1937年，王福时根据斯诺手稿编译出版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》（又称“前西行漫记”），比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英文原版早问世7个月。他还曾陪同海伦奔赴陕北，记录下红军与根据地的真实面貌。

4个月的实地采访，最终凝结成震撼世界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首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。1937年10月，这本书在伦敦首版，迅速在西方掀起热潮；次年2月，中译本《西行漫记》由上海复社秘密出版，无数进步青年捧着这本书，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。展柜里的首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格外珍贵，扉页上斯诺的字迹清晰有力：“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宋庆龄，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此书的人，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。”

晚年的斯诺三次重返中国，在中美关系的冰封期作着民间破冰的努力。1972年2月15日，他在瑞士溘然长逝，仅仅6天后，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，当月28日，中美《上海公报》在锦江小礼堂签署。从上海开启中国旅程，到人生终章与这座城市形成历史呼应，斯诺的一生始终与上海深深联结。

库房里捞出馆藏家底

丰富的展品与清晰的叙事脉络背后，是策展人周煜带领团队从零起步的一年攻坚。对上历博而言，斯诺主题是完全陌生的选题，馆内既无相关研究积累，也无对应藏品储备，一切都要白手起家。

和传统“先有藏品再定主题”的策展逻辑不同，本次展览先锚定“斯诺”主题，再反向摸排馆藏。博物馆文物库房位于周浦，是多家文博单位共用的公共仓库，检索系统无法通过“斯诺”“长征”等关键词直接匹配结果。周煜只能先梳理出上百种同期相关文献的清单，再逐条对照数据库核对，前后摸排了三四轮。

这样的核验，她一共往返跑了4趟周浦库房。纸质文献不能草草翻检拍照，需逐页梳理内容、确认品相；不少脆化严重的文献，得先申请古籍修复才能达到展出标准。最终从库房里挖掘出的成果远超预期：1937年《逸经》杂志上署名“幽谷”的《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》，作者正是护送斯诺进入苏区的地下党员董健吾；上世纪30年代刊物《战时文摘》上连载的长征报道，刊载时间早于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正式出版；还有1938年版《毛泽东自传》单行本，完整收录斯诺与毛泽东的对谈原文，此前一直封存于库房，从未公开展出。

摸清了自家家底，周煜又开始琢磨怎么让展览跳出“文献封面堆砌”的枯燥感——毕竟观众走进展厅，更希望看到有温度、能共情的实物。为此她专程赴陕西对接跨省借展。海伦的打字机属于国家一级文物，出省展出需国家文物局审批，审批流程漫长，最终能否获批也充满不确定性。馆方需提交完整展陈方案，详细论证文物的展陈定位、保护措施与亮点设计。直到开展前十天，这批外地借展文物才最终敲定。期间有人提议用复制品简化流程，周煜始终坚持：“原件带来的震撼感，是复制品替代不了的。”

除了展品，周煜对展览的视觉风格与在地表达也反复打磨。她跳出传统红色展览的惯性，摒弃全红底色，采用更柔和的海派视觉风格；所有一、二级导视牌配英文翻译，适配上海的国际访客群体。在她看来，上海是斯诺思想转变的起点，却长期缺少系统的斯诺主题公开展，这次展览正是要补上这一篇章，把斯诺与上海的关联讲透。

跨越三代的史料守护

展厅里两台并排放置的老式打字机，不仅是海伦在苏区采访的见证，也牵出了进步青年王福时与斯诺夫妇的一段往事。

王福时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，在学校期间，主办进步壁报《昨日与今日》，在学生中传播左翼思潮，并与斯诺夫妇结交。1936年斯诺从陕北返回北平后，将第一手英文采访稿交给他整理。时年25岁的王福时组织同学日夜赶工，1937年3月编译出版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》，比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英文原版早7个月问世，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红军与长征的中文读物。1937年4月，他又以翻译身份陪同海伦奔赴延安，带去整整一箱刚印好的新书。此后半生，他始终站在爱国进步阵营一边，赴南洋办报募捐、在香港投身抗日救亡，晚年赴美仍与共产党人合作办报发声，一生堪称“中国共产党的挚友”。

这段在今天看来极具分量的经历，在王家人的生活里却沉默了数十年。王福时的儿子王复强回忆，父亲只把延安之行当作青年时代的一件平常事，直到改革开放后斯诺重新受到关注，才偶尔和后辈讲起细节。

2011年父亲离世后，整理旧档案的担子落到了王复强肩上。单靠家中零散留存的手稿与旧物，拼不出完整的历史细节，王复强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外馆藏。今年年初，70多岁的他在儿子陪同下赴美寻档。父子俩驱车往返近四千公里，辗转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、杨百翰大学特殊文物收藏馆，在海伦的遗物中找到了1939年王福时从南洋寄来的亲笔信。信中那句“我仍珍藏着与你一同前往红色首都的亲切回忆”，与海伦日记的记载形成完美互证。

得知上历博筹备斯诺主题展的消息后，王复强主动联系了策展团队，将家族珍藏数十年的手稿、书信与打字机悉数拿出参展。有人劝他把家传史料留在家里，他却觉得，父亲当年编译书稿本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真相，如今把这些东西放进公共展厅，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，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。

展厅里的观众来来往往，有人在打字机前驻足良久，有人对着泛黄的书信与老照片轻声讨论。周煜仍每天泡在馆里，巡场、记反馈，琢磨着哪里还能再打磨得更细一点。“这个展览不奢求一眼震撼的视觉冲击，”周煜说道，“只希望人们能慢下来，顺着展墙的脉络，读懂一个美国青年如何在上海完成思想的转向，读懂那些动荡年代里普通青年的热血与抉择。”